



逻辑何为

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晋荣东 · 著

逻辑何为
——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晋荣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 晋荣东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495 - 6199 - 5

I. ①逻… II. ①晋… III. ①逻辑学—研究—中国
IV. ①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2487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肖莉

特约编辑:李春勇

装帧设计: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4 字数:356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7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晋荣东, 1971 年生于四川成都, 199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9—2010 年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推理、论证与修辞研究中心作访问研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暨秘书长、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逻辑史、非形式逻辑与论证理论、逻辑哲学以及中国近现代哲学。

参与编写《逻辑学导论》(2000)、《逻辑学基础教程(修订版)》(2009)、《中国哲学史》(2012)等教材, 出版著作《法不容情: 法家思想的演变》(1995, 2001)、《李大钊哲学研究》(2000)、《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合著, 2002)、《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2005)等, 并在海内外学术刊物或文集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上海市曙光计划(2007)、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8), 获上海市育才奖(2004)、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200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06)和三等奖(2002)。

总 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上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 and 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 100 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序

彭漪涟

中国古代长期忽视形式逻辑,而朴素的辩证逻辑却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一些西方逻辑学家的逻辑论著和逻辑思想较集中地被介绍到国内,初步扭转了形式逻辑不受重视的局面。但这主要仍限于传统逻辑,而对当时在国外已迅速发展的数理逻辑未予重视,缺乏必要的介绍与研究。直到 1927 年汪奠基著《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的问世,才开始有了改变。到 30 年代中期,金岳霖著《逻辑》的出版标志着我国逻辑学家在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应当肯定,近代中国在逻辑科学的探讨传播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的总结,而正如冯契所指出的:“理论的演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系统的总结,才能提高自觉性。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总结,那便会陷于盲目性。”^①这一点,在我国 20 世纪 30 年代由“唯物辩证法论战”所引发的、一场关于如何认识 and 对待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论战中便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一些人(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人)坚持形式逻辑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对唯物辩证法或辩证逻辑作为科学方法的正确

^① 冯契:《〈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序》,《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88 页。

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系统的否定;而另一些人(进步的哲学家)为了捍卫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及其指导地位,在未划清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界限的条件下,对形式逻辑进行了不适当的批判和否定。其实,争论双方都是把形式逻辑同辩证法、辩证逻辑绝对对立了起来,视为毫不相容的两种方法和两种逻辑了。这场论战突出暴露了当时哲学界在逻辑问题上的片面性和盲目性。

这种盲目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关系的讨论中又继续暴露出来。这场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虽然较多,但要害仍然在于划不清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界限,不能正确理解与判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的关系。与此同时,数理逻辑及其最新成就仍然被置于大多数讨论者的视野之外,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因而严重阻碍了它在我国的正常发展。

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逻辑科学经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然而人们也正是从这场浩劫中、从“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中开始清醒起来:从其用语录代替一切、随意引申、胡乱发挥、乱扣帽子、随意栽赃等不讲逻辑,特别是不讲推理、论证的恶劣表现中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必要性;从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猖獗、泛滥所带来的恶果中意识到学习和研究辩证逻辑的必要性。正是因此,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曾掀起学习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也包括辩证逻辑)的热潮。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也开始受到逻辑工作者的重视,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也成为多数逻辑工作者的自觉要求。所谓逻辑现代化,实则逻辑教学和研究现代化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并由此而展开了逻辑教学和研究是否需要和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

但似乎好景不长。近十年来,虽然逻辑工作者队伍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逻辑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学生的素质培养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越来越显现,然而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与配置中,在普通高校的自学考试,以及在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中,逻辑学的地位与作用都显现出某种下降的趋势,逻辑学似乎越来越为人所漠视,越来越陷入某种困境。这究竟是为什呢?逻辑学在我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为什么总是这么步履蹒跚、历经艰难曲折呢?逻辑学重新振兴的希望之路又在哪里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警示人们,逻辑工作者不能再继续陷入盲目性了,逻辑

学是到了应该冷静地回顾自己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自我反思的时候了,是到了应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并由此上溯到中国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逻辑科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在认识 and 对待各分支学科及邻近学科的相互关系方面,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由此获得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等进行自我批判并做出总结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国逻辑科学以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有客观的、清晰的理解,才能避免对某些问题的争论或讨论,常常出现某种并非螺旋式上升的重复现象,从而也才能逐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逻辑科学历经坎坷的主要原因,并找到摆脱这种现状,促进我国逻辑科学不断发展和振兴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而且也只有自我批判的条件已准备好了的时候,才能够对过去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做出客观的理解。^① 伴随着当代中国逻辑科学发展进程而成长起来的中国逻辑工作者正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正因此,近年来已有一些逻辑工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当代中国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开始进行反思和回顾,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晋荣东同志的《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写成的。它从逻辑学所肩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自身需要现代化;另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应当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出发,围绕现代性这一基本原则和要求,把逻辑现代化学置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全局的视野中去分析考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逻辑科学在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逻辑学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联系国内外逻辑工作者就这些方面和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与讨论,进行了有重点的,但是系统的反思与回顾,实际上是在尝试对之做出初步的批判性总结。

毋庸置疑,要正确地进行反思与回顾,要科学地做出批判性总结是不容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易的。关键在于作者必须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和熟悉当代逻辑科学发展的现状及前景,明确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掌握必需而充分的学术资料(包括相关的新成就和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通过“人体解剖”而把握住“猴体解剖”的钥匙,才有可能对以往阶段持有正确的理解,从而做出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论断。就此而言,《逻辑何为》一书所做的工作,总体上还只是探索性的。因此,它自然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进一步讨论、推敲的问题。但不管如何,作为对这一逝去阶段的反思之作,无论其做得如何,做到了多少,也无论其还将引起多少不同的意见,还有多少问题尚待进一步去努力探索和明确,它都是值得人们欢迎的、肯定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说,都只有当它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和通过反思而对自己的历史有客观的理解时,才能真正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而这种自我批判和系统反思,即使是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也还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经过认真研究和自由讨论,然后才能集中智慧去逐步完成。因此,只要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探索者,他们的工作都将是有益的、值得赞许的。否则,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努力、去探索,无论我们个人主观上有多么强烈地发展逻辑科学的愿望,无论我们会争论得多么热烈,也无论我们如何去认真努力,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而事倍功半的。近代历史上的几次大讨论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不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么!

写到这里,抚摸着厚厚的书稿,回忆着书稿中的那些真知灼见,不由得 not 让人感慨系之。晋荣东同志可说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年轻的逻辑工作者,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都是中国哲学。前几年,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毅然转而从逻辑学的研究与教学。基于读硕士、博士学位时所奠定的扎实而深厚的哲学功底以及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再由于他的勤奋和执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游刃有余地担负起普通逻辑的教学工作和逻辑专业研究生的中国逻辑史和辩证逻辑的教学工作,而且还遍览了他可能找到的中外逻辑学者所写的最新论著,并陆续公开发表了一批有关普通逻辑、辩证逻辑、中国逻辑史和非形式逻辑的论文,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这充分证明,一个年轻学人,只要能不囿于个人名

利观念的束缚,不追逐虚名、曲学阿世,不心浮气燥,而能专心学术,甘于寂寞,不怕坐冷板凳,认真打好自己的专业基础,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再加上研究方向选择适当,个人勤奋努力,就一定能在学术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为学术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这也证明,我们的年轻一代一定能珍惜和充分利用当前这宽松而较优越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抓住机遇,奋力拼搏,迅速超越老一代学者,而把我国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这原本就是历史的必然。宋代词人李清照曾咏叹“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现在中国的逻辑科学是到了应该让后来人更多地去伤脑筋的时候了。我坚信,他们同样会把李清照的咏叹更欢快地继续咏唱下去,自觉地承担起进一步振兴我国逻辑科学的历史重任。

2005年9月



智慧的探索丛书

阿尔都塞哲学研究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古代基督教史

“回到康德”：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之后”

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结构推理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诠释学导论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修订本)

生命边缘的德性

事实论

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宋儒境界论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

味与味道

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

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

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郑忆石著

陈卫平著

徐怀启著

安维复著

陈 赟著

冯 棉著

陈立新著

杨国荣著

晋荣东著

童世骏著

潘德荣著

冯 契著

刘仲宇著

颜青山著

彭漪涟著

顾红亮著

付长珍著

张晓林著

贡华南著

郁振华著

郦全民著

高瑞泉著

方旭东著

目 录

导论 / 1

第一章 现代逻辑的规范性及其问题 / 19

第一节 有效性:现代逻辑规范性的效力之源 / 21

第二节 来自论证评估实践的质疑 / 24

第三节 现代逻辑规范性的理论反思 / 31

第二章 从传统逻辑到非形式逻辑 / 43

第一节 传统逻辑的论证理论及其主要问题 / 44

第二节 非形式逻辑的本质与主要论题 / 61

第三节 非形式逻辑的现代性特征 / 77

第三章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逻辑合理性观 / 95

第一节 现代逻辑合理性观的基本特征 / 96

第二节 后形而上学之思的启示 / 102

第三节 现代性反思与逻辑合理性观的转型 / 114

第四章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 133

- 第一节 现阶段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诸种姿态 / 135
- 第二节 名辩学、中国古代逻辑与逻辑史的书写 / 145
- 第三节 从“据西释中”到科学的比较法 / 154
- 第四节 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 166

第五章 传统名辩的现代诠释(上) / 183

- 第一节 言与文:语言的双重功能 / 184
- 第二节 言语交际的规范与原则 / 187
- 第三节 正名与意义理论 / 202
- 第四节 性与天道:言语交际的限度 / 206

第六章 传统名辩的现代诠释(下) / 211

- 第一节 主体间论辩之必要与可能 / 212
- 第二节 庄子:“辩无胜”及其复杂性 / 216
- 第三节 后期墨家:“辩胜,当也” / 222
- 第四节 “辩无胜”与“辩有胜”之争的真理观意蕴 / 227

第七章 作为辩证逻辑的论辩术 / 233

- 第一节 古希腊论辩术的历史发展 / 234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及其逻辑特性 / 246
- 第三节 论辩术的当代复兴 / 259
- 第四节 对进一步推进辩证逻辑研究的启示 / 272